

# 镜子和七巧板

比较文学论丛

杨 周 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 新  
责任校对 王 新  
封面设计 式 一  
版式设计 高建军

**镜子和七巧板**

比较文学论丛

杨周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总 经 销 处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6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册

ISBN 7-5004-0584-7/I·67 定价：2.60元

## 内 容 简 介

杨周翰先生是国内外比较文学界著名学者。在这部论文集中，作者提出并探讨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些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如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差异，文学中的巴罗克，等等；而在对中外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及作品翻译的比较研究中，作者探究其不同的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渊源，由此产生了研究问题的新的角度和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作者还介绍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动态，并对国内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预测。

#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 编辑委员会

顾问：李羨林 杨周翰 李赋宁

主编：乐黛云

副主编：王 宁

编委：王 宁 乐黛云 伍晓明  
张文定 程朝翔 温儒敏  
龙协涛

## 序

近十年来比较文学在我国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已成为“显学”。对这门“复兴”了的边缘学科感兴趣的大有人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国内“科班出身”的比较文学专家是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更多，但我不在其中。不过，正如有人说过，研究文学而不比较，那还算什么文学研究？这无疑给了我勇气。但终究是邯郸学步，有类效颦而已。

这里收集的十一篇文字，都是近年习作。大部分都是发表过的。有四篇原作是用英文写的，承王宁和黄满生两同志译出，由我略加校订。《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一篇，属报导性质。《比较文学：界限、“中国学派”、危机和前途》一篇，则是汇集了零散文章中的一些看法，合成一篇，作为参加讨论的发言吧。其他都是就某些题目或某些作家作的一些探索。

这些文字虽或多或少都与比较文学有关，但终觉斑驳，称得上是“杂俎”吧。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菲尔丁在他的巨著《汤姆·琼斯》开头的地方曾说：一个作家发表一部作品就象开饭馆的提供菜饭，而不是贵人请客。贵人请客，客人对菜饭只能说好吃，不能说不好吃。作家是开饭馆的，客人花钱来吃饭，饭菜不好，客人可以批评，甚至可以……。菲

尔丁说得很诙谐，但精神可取。我就用他这段话结束我这短序吧。

一九八八年六月

# 目 录

- 1 序
- 1 比较文学：界限、“中国学派”、  
危机和前途
- 12 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
- 22 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  
评观念的主要差异
- 33 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为文学的  
历史叙述
- 60 维吉尔和中国诗歌传统
- 70 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  
《红楼梦》中的作用
- 80 《李尔王》变形记
- 93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书后
- 99 莎作内外
- 155 中西悼亡诗
- 169 巴罗克的涵义、表现和应用

## 比较文学：界限、“中国学派”、 危机和前途

将近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经历了“复兴”而成为“显学”。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会，许多省、市也成立了省、市的学会。许多大专院校设置了比较文学的教研组织，开出了课程，招收了研究生。出版了许多比较文学的专著和译著，办了一些专门的刊物，包括英文的刊物。在这些刊物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更是为数可观。举办过几次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讨论会。无论在专著或文章中，或在讨论会上，都发表过不少很好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为了学科的发展，我也想就几个问题谈谈我的意见，参加讨论。

### （一）比较文学的界限。

在一些讨论会上提出一种意见，认为比较文学不一定要跨国界，可以在一国之内进行不同民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也应纳入比较文学范围。我很同意这看法。1985年全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期间我就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其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西方（欧洲），跨国界和跨民族几乎是一回事。当然，在西方所谓“民族国家”中也有多民族的问题，但从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史上看，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把一个国家的主要民族的文学和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的主要民

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一个国家之内，主要民族的文学和少数民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他们那里纵使有，恐怕也居次要地位。但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尤其是丰富的口头文学，这些文学或者和汉文学有关，或者和汉文学一起同另一个或另一些外国文学有关系。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怎能说不是比较文学呢？比较文学的界说里还有一条，那就是“不同的语言”。用不同语言创作的文学肯定是不同民族的文学。我想可以说，凡是不同民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都应归入比较文学。

混淆民族和国家的界线曾引起过这样一种误解，即将比较文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把本民族文学中各种文体、流别进行比较研究也叫做比较文学。这样一来，比较文学在中国也就“古已有之”了。例如春秋时代，中国有许多封建“国家”，把这些“国家”的诗歌进行比较，算不算是比较文学呢？这些“国家”恐怕不能算做不同的民族吧，虽然他们可能有不同的部落渊源。而且书面语言又是相同的。《诗经》中各国的国风，可能有所不同，但恐怕还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强调民族的不同和语言的不同，归根结蒂还是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只有把文学放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上来研究，求出其异同，其结果才有更丰富的意义。而在春秋时代，华夏文化已形成了。

也许有人说，比较文学已渐渐发展成为一门开放性的学科，而且它本身也未定型，一国文学内部的比较仍应归入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所谓“开放性”这概念来自跨学科的概念，一国文学内部的比较当然不能算是跨学科。诚然，开放性有一个程度的问题。比较文学从影响研究扩展

到平行研究，扩展到文学和艺术、和其他人文科学的比较，文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比较，而且也有了这方面的实践，如文学和历史，文学和神话，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宗教等的关系的研究。我记得80年代初奥本尼纽约州立大学举行过文学与航天科学的讨论会。人类各种活动本来是互相有关联的，不过文学和航天科学的关系可能是开放性的比较文学迄今为止达到的极限了。但基本的一条是要跨学科。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文学的目的和功能的问题。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须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遍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研究所无法达到的。这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用比较的结果来充实他们所谓的“总体文学”。①

（二）所谓“中国学派”。几年来国内外都有一个呼声，要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认为我们不妨根据需求和可能做一个设想，同时也须通过足够的实践，才能水到渠成。所谓“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云云，也是根据实践而被

---

① 法国人发明的“总体文学”的概念，有人认为含糊，但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指总的文学潮流、问题和理论，或关系”。参看《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第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如此命名的，起初并非有意识地要建立什么学派。

我说可以有设想，也有人做过设想，如国外学者就提出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当成为所谓“中国学派”的特色或重要内容。许多西方学者认识到，尽管目前研究比较文学的论文可以装满几个图书馆，但关于东方文学，特别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文学的研究，却还很肤浅。<sup>①</sup>东方文学的研究，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打破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迄今的欧洲中心论，而且也是东方比较学者责无旁贷的义务。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尖端问题有待于我们去探讨和研究。在东方范围之内，我国国内少数民族的比较文学也理应成为“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实践，有待于全面总结，在此我只想就两方面提些看法。

第一方面，有的台湾和海外学者用西方的新理论来研究、阐发中国文学。他们认为“中国学派”应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例如王国维和吴宓就分别用西方哲学和西方文艺观点研究过《红楼梦》，阐发出一些用传统方法所不能阐明的意义。也许有人说，这不是比较文学，只是用舶来的理论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文学，或用舶来的方法阐释中国文学，而不是不同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不过我认为从效果看，这种方法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有一致的地方。因为在甲文学和乙文学的比较中，甲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尺度或手段，用以阐发出乙文学的蕴义、特色等等。所不同者，文学和文学的关系里还有相互阐发的问题而已。当然，用外

<sup>①</sup> 《域外文集》，第11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来理论有时会产生生搬硬套的弊端，但这不是这种做法本身的弊端。

第二方面就是要回顾一下我国比较文学的历程。发展一门学科总要在前人止步的地方继续走下去。前人错了，我们可以避免他们的错误；前人有好经验，我们应予发扬。

87年6月我在日本京都日本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讲了一次《中国比较文学的今昔》，我分析了中西比较文学起源之不同。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或萌芽状态的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比较文学为什么在学院中兴起当然也有社会原因和其他原因（如哲学），不过直接起因是学院里要解决文学史的问题。而中国比较文学则首先结合政治社会改良，而后进入校园的。

要比较，首先要意识到有外国文学的存在。外国文学引进中国是在清末海禁被打开之后。海禁被打开后，使知识界最先接触到外国文学。作为古文家的林纾惊异地发现西方小说写生活尤其写下层社会的生活写得这样生动。西洋小说中情节的曲折，人物的刻画，对话，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他认为可以和中国史家如司马迁比美，和古文家比美。不过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不仅因为他欣赏西洋小说的“文笔”，认为中西有相通之处，他也透露了他翻译西洋小说的另一目的。例如他译《黑奴吁天录》就把黑人的遭遇作为借鉴，以警醒黄人。他虽不是改良派，但他恨国力既弱，今日“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所以他译此书，“使倾心彼族者”“吾书足以儆醒之”，有很鲜明的社会意识。

梁启超对西洋和日本小说发生兴趣更是出于政治改良的

原因。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他认为创造一种新型小说可以振奋国民，革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术，以至人心。这些言论当然算不得是比较文学，但有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后，进一步做比较时，也必以这思想为出发点。例如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说：“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但他惋惜中国没有长篇史诗，因此他一旦发现黄公度《锡兰岛卧佛》一诗就大为欣喜，说：“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并说：“吾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梁启超也做过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如《翻译文学与佛典》，在此他指出佛典与中国小说以至杂剧、传奇、弹词也不无关系。顺便说一句，梁启超治史也主张用当时西方的治史方法来改造中国旧史学，主张不为死人写史，主张客观性，主张探索“来因与去果”（虽然他后来又怀疑因果律）。

鲁迅写《摩罗诗力说》（1907）目的也很明确：“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又说：“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

《摩罗诗力说》本身虽是欧洲浪漫诗人的介绍和比较，但当鲁迅谈到西方文化和思想时，当他总结浪漫派诗歌时，无不和中国进行对比。他在结束时间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即使象王国维这样一位“纯”学者也不是脱离实际的。他完全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缺陷，因而感到有沟通的必要。他在给日本人西村天因译的《琵琶记》作的序（1913）中有这样的话：“近二百年来，

瀛海大通，欧洲之人讲求我国故者亦夥矣，而真知我国文学者盖鲜。”其原因是“道德风俗之悬殊”。因此欧洲人翻译的中国“国故”“外不能喻于人，内不能谦诸己。”他举例说象英国人大维斯译的《老生儿》（1817）只译了科白，完全不了解“元剧之曲但以声为主，而不以义为主。”

我国比较文学的发端除了结合政治、社会、文化实际这一潮流以外，还有另一股潮流，那便是用从西洋输入的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化和文学。前面提到梁启超治史也属于这一潮流。这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因为它是真正做出成绩来的潮流。王国维就是用西洋的观点（叔本华哲学）研究《红楼梦》，用主客观的观点论词（《人间词话》）。他的《宋元戏曲考》虽不属比较文学，但具有宏观的观点，指出《窦娥冤》、《赵氏孤儿》“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色。”茅盾研究中国神话用的是比较人类学的方法，把中国神话整理出了一个头绪。茅盾也做了中国神话和希腊、北欧、印度神话的比较研究。郑振铎主张文学改良，主张新文学，主张重新估价中国文学。他和早期鲁迅一样，服膺进化论，他提倡用进化论的观点研究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他用可能来自普罗普（Vladimir propp）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1927）里的方法研究中山狼的故事。吴宓在《红楼梦新谈》（1920）里，用西方小说的标准衡量《红楼梦》，他的结论是《红楼梦》不仅满足而且超过了这些标准。可见引进外国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在我国有这传统，而且做出了成绩。

在过去的比较文学实践中，似乎影响研究多于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这可能和我国做学问重考据的传统（所谓“汉

学”）有关，甚至创作也要“无一字无来历”。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sup>①</sup>，史书多得“不可得遍读”<sup>②</sup>。汉学做学问的传统，史学的发达，说明我国文化中，我国学者的心态中，历史意识特强，事事都要溯源，养成“考据癖”。这种文化熏陶使人们看到本国文学受外来影响，或外国文学中有中国成分，就自然而然要探个究竟。

我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很值得深入总结，但就以上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过去比较文学的实践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都和社会生活相联系。这个传统能不能继承、应该不应该继承呢？我想回答是肯定的。但怎样使比较文学和现在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2. 我国早期学者多用外来的方法和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卓有成效。这个途径我觉得应当算做“中国学派”的一个特点，理由前面已经提到。

3. 尽管影响研究做得很多，但有待深入，此外还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有待开发。平行研究过去做得较少，就现状看，更是有待提高。至于跨学科研究，除了老一辈学者如朱光潜、伍蠡甫、钱锺书等外，展开得更少。

国际上也有学者反对区分派别，当然也不赞成讨论建立中国学派，提出与其区分派别，不如共同研究问题。套用胡适的话就是“少谈些学派，多研究问题”。当然比较文学中有大量的问题，特别是文学理论问题迫切须要讨论研究，但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同上书，第30页。

这和学派问题并不矛盾，可能反而有助于理论的探讨。

（三）危机与前途。在国外，首先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是韦勒克（1958）。他所谓的危机是指法国学派把这门学科变成了“文学外贸”，只以研究相互关系为满足，而忽略了文学本身。到了70年代，西方比较文学界又感到了危机，这次危机指的是一浪追一浪的“新理论”对比较文学的冲击，好象要使比较文学失去它的存在，取消了它应有的作用。此外，在国际上比较文学似乎也不受重视。例如1987年6月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比较文学讨论会上，荷兰学者塞格斯就说：“大家都认为比较文学遇到了危机。危机是有的。它来自比较文学的外部 and 内部。内部指的是新的文学理论对比较文学的冲击；外部则指在现代技术统治一切的社会，人文科学和比较文学受到轻视和威胁。目前比较文学也确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很难向前推进。因此，比较文学必须寻求新的模式，走出一条新路。”<sup>①</sup>出路何在呢？塞格斯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创造性的工作如不能取得有价值的社会效益，就是空的。”塞格斯接着说：“大家都认为目前的人文科学还不如一台复印机，老是重复别人的话。”

国内的比较文学虽然“复兴”不久，但有识之士也看到了隐伏的危机。一方面，和国外一样，我国知识界、研究界、文艺界对比较文学不甚理解。另一方面，危机指的是热心比较文学并积极实践的作者群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有成绩，但多数停留在浅层次上，有待更上一层楼。

危机并非坏事，有了危机感，事业才能前进。纵观国外国内所谓的危机，有的已成过去，如韦勒克所提出的危机。

① 参看《中国比较文学通讯》第19—20页，北京大学，1987年第2期。

塞格斯所提出的危机倒是触及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我们前面谈的早期我国比较文学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比较文学有，外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他人文科学研究都有。怎样产生社会效益？恐怕不能把研究美国小说家黑利的作品和机场、旅馆、银行的管理联系起来产生社会效益吧。“《三国演义》和人才学”、“《红楼梦》与经济效益”这类题目恐怕也不是联系实际的正路吧。我想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及人文科学应当能满足时代的精神需要，而不是如塞格斯所说的复印机，这才是一个“新的模式”“一条新路”。

至于新理论的冲击，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已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这可能是一个适应问题。新理论，如解构学说，乍看似乎是语言学和哲学上的认识论的问题，与文学无关，很难应用到实际文学批评上来。但是在国外，用这新理论来阐释文学现象已大有人在，这说明了它的有用性。

至于国内的危机云云，我想不能仅看到眼前的状况或不久的将来的可能的状况，而应看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前途。它之所以有前途是因为它能起到积极作用，这在前面谈到它的目的和功能时已有所说明。其次，我觉得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中外文学、中外文化的关系或相互影响还远非已经穷尽。又如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刚刚开始。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少数民族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有的只有少数人在从事，有的可能还没有人在做。至于跨学科的比较和用某种外来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则在目前还是两个弱点。此外一定还有许多空白。

当然要完成这许多任务，须要创造条件。条件指装备问